

# 浅谈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

龙璐

(浙江树人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 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佛经翻译和古代《圣经》翻译的历史, 总结了两者发展的共同规律并对其中的直译现象进行了对比, 揭示了宗教翻译中直译现象占主导地位的本质并阐明了直译法在古代欧洲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 直译; 意译; 佛经翻译; 圣经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08)02-0101-02

## O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Bible

LONG Lu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that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ancient West, summarizes the developing rules shared by both of them, and pres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in them respectively. The main reasons why literal translation has gained an upper hand in the religious writings in ancient times and why literal translation in ancient Europe got better development than that in ancient China are give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ion; Bible translation

### 一、引言

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对立的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存在着直译与意译, 形式与内容, 理解与表达, 忠实与通顺等多对矛盾。翻译实践的过程一直致力于为解决上述多对矛盾提供最好的理论依据。自翻译诞生以来, 直译和意译这对矛盾可以堪称为中西翻译界人士争论和探讨的最多的问题。纵观中西翻译史, 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是中西历史上两项规模宏大的宗教翻译活动, 而其中直译与意译的使用则是翻译家们争论的最为频繁和激烈的话题。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 对比研究这两项翻译活动, 总结出佛教翻译与《圣经》翻译发展的共同规律: 直译与意译两原则交替主导翻译的整个过程并逐渐趋于成熟直至最终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但是在特定的时期, 直译现象占主导地位。

### 二、佛经翻译的历史

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翻译活动, 它的兴起源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我国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已经式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佛经翻译史悠久, 其译者之众, 译经数量之多在世界翻译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文”指“辞采”, 即修饰译文, 使之通达; “质”指“朴质”, 即紧扣原文, 不增不减。“文”与“质”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译”与“直译”。

安世高, 西域安息国太子, 博学多识, 信仰佛教, 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8年), 辗转来到中国洛阳开始译经, 是我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的第一人, 也是翻译史上最早的质派译家。安世高的汉译佛典, 可算是一种创作, 内容和形式都有特色。至于译文形式, 因为安世高通晓华语, 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 说理明白, 措辞恰当, 不铺张, 不粗俗, 恰到好处。但总的说来, 他还是偏重于直译。有些地方顺从原文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如“受”译为“痛”, “正命”译为“直业治”等)。因此道安说安世高的翻译力求保存原来面目, 不喜修饰, 骤然看到还有难了解的地方。

释道安(314-385),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 出身士族, 是东晋时

杰出的佛教学者和翻译家。道安的后期活动主要从事译经, 他是著名的质派大师, 强烈主张采用直译的手法, 以求保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道安不懂梵文, 他在研究佛经的过程中, 开始研究翻译。这种研究是通过对比同本异译的比较而进行的。道安认为简略而不像原文那样繁复的译文, 其实是掺了水的葡萄酒并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 三不易”的理论。因此, 在道安时期的佛经翻译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死译。

与此相反, 在佛经翻译上主张采用意译的是后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 祖籍天竺人。罗什精通佛学, 又晓汉语, 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 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 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 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 都是前此所未有的。<sup>[2]</sup> 罗什是文派的译经大师, 开创了翻译的新风: 译文融洽汉文和梵文, 文笔空灵, 辞藻华丽,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他倾向于意译, 在意译原则的指导下, 也常常对原文加以删削, 所以译文也有不达之处。

梁陈之间, 又有著名译家真谛(499-569)。他是西印度优禅人。在佛经翻译上他主张采用直译的方法, 认为翻译不可以求“文”而失“信”。真谛在他流离颠沛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佛经的翻译, 此外, 梁代名僧慧远在翻译佛经时也非常赞同真谛的观点。

玄奘(602-664), 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伟大的译家之一。玄奘精通梵语, 深通佛理, 汉文程度又好, 他担任了唐朝一半的佛经翻译工作。虽然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玄奘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从其译文看他实际上做到了将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 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在玄奘看来, “文”与“质”并无一定的标准, 直译与意译也难作截然的区别, 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 即用音译法。具体提出了五种翻译情况不翻, 即神秘语, 多义词, 中国没有的物名, 久而通行的音译, 以及为宣传佛教需要的场合。<sup>[3]</sup> 直至当今, 玄奘在佛经翻译上所采用的灵活译法仍然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由于在佛经翻译上的突出贡献, 鸠摩罗什, 真谛和玄奘被视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译家。

总之,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无论是对翻译理论、翻

收稿日期: 2008-01-20

作者简介: 龙璐(1982-), 女, 湖南衡阳人, 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助教, 硕士生, 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译史,还是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都是一个宝贵的研究遗产,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 三、《圣经》翻译的历史

如同中国佛经翻译的整个过程,西方的《圣经》翻译也同样经历了直译和意译之争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西方的翻译史是在公元前3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3至2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它的翻译有两大特点。首先,它不是个人单干,而是多人合作的结果,从而开了翻译史上集体合作的先河。集体翻译有一大优点,即可使译文的准确性有所保障。其次,由于七十二名译者都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此,尽管希腊语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但他们毕竟不是在希腊,周围非希腊语言环境以及祖先的语言无疑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译文的质量。另外,由于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准确,所以译文词语陈旧,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象希腊语。这个译文为保持《圣经》原状,做到了十分准确,因此为教徒奉为经典译本并且在翻译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他主张译作超过原作,译者高于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塞罗打破了翻译只限于实践,不过问理论的局面。西塞罗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主要见于《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这两部著作。他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很显然,西塞罗主张活译,反对直译。西塞罗对翻译理论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员”式翻译,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sup>[4]</sup>

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有影响的人物应数斐洛·犹太欧斯(公元前20?-公元50?)。斐洛在谈到《七十子希腊文本》的翻译时,强调译本的神圣性来自于上帝的感召。他的这一理论对《圣经》翻译起了重要作用,被许多人奉为衡量《圣经》翻译的准绳。实际上坚持“受上帝的感召”是一种逐字逐句直译死译的作法,可在当时却盛行一时。正因如此,在许多方面,《圣经》翻译的质量远不及文学典籍的翻译。翻译家死抠字眼,译文质量低劣。同时期采取直译翻译圣经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阿奎拉、西奥多西翁和辛马库等一批译家。

哲罗姆(347?-420)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他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他最著名的译作是他主译的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该译本的权威性在当时至高无上。哲罗姆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卓见的翻译理论家。他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思想,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应当采用直译。<sup>[5]</sup>哲罗姆把直译和意译看成一种互补关系,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承认自己有时意译,有时直译。<sup>[6]</sup>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充分地看到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哲罗姆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在《圣经》翻译上他同三百年前的斐洛持有同样的观点,即《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sup>[7]</sup>显然,他主张逐字逐句的直译方法。虽然他没有亲自参与圣经的翻译,但是他这种忠于原文的直译法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一大批译家,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总体说来,无论是在中国的佛经翻译还是在西方的《圣经》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问题永远能够激起翻译家们无穷的兴趣和争辩。在众多翻译家中,中国的道安,真谛,西方的斐洛、奥古斯丁主张采用直译法;中国的鸠摩罗什、玄藏和西方的西塞罗、哲罗姆主张坚持意译法。纵观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翻译家们的争辩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那就是由死板的字当句对的直译法到灵活多变的意译法。他们的争辩为后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 四、宗教翻译中直译现象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在宗教翻译史上,特别是在古代,直译法要胜于意译法且被广泛采纳。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当时许多主持宗教典籍翻译的译者可能不是专业译者或者

缺乏足够的翻译实践,尤以中国的道安和罗马帝国的奥古斯丁为代表;他们当中很多都不懂外语,如佛经的译者道安和赵政。由于在翻译实践方面的匮乏,他们在是否采用意译法的问题上都持有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那个年代,直译法作为翻译的首要指导思想盛及一时,被绝大多数翻译家们所恪守。

2. 在古代,很多参与或主持宗教典籍翻译的人不仅是博学多才的学者也是虔诚的僧人、神学家或传教士。道安和玄藏都是满腹经纶的高僧;真谛是西印度优禅人;鸠摩罗什是龟兹国的名僧,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古罗马帝国的西塞罗、哲罗姆、斐洛及奥古斯丁等人都是著名的神学家,他们大多都在教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此外,奥古斯丁和斐洛还坚信《圣经》的翻译应当是“受上帝感召的翻译”,因此,直译死译的作法盛行一时。显然,他们的翻译实际上是为政治和宗教目的服务的。在这些虔诚的教徒眼中,宗教典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对他们宗教的盲目迷信,竭力推崇以及狂热信奉无一不在译本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之所以采用直译法是因为他们担心不正确的选词造句会曲解原意,因此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不顾及语言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

3. 那个时期的翻译家无论是在翻译实践方面还是在语言掌握和运用的程度上都远远不够,他们很难正确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采用直译法,什么语境中应当采用意译法。因此,他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直译法就是最忠实的翻译方法,反之,意译法则是不忠实的翻译方法。总体说来,那个时期的译者大多偏重于直译法,而对于意译法,他们往往是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 五、直译法在古代欧洲发展更好

据笔者搜集的各方面资料显示,直译在《圣经》翻译中被广泛使用,而在佛经翻译中运用却十分有限。究竟是何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如下:由于欧洲的语言同属于印欧语系,因此它们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特征。早期的《圣经》翻译主要是在印欧语系之间进行的,这些语种都源于同一语系,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不那么明显。此外,古代欧洲的语言同当今的语言相比发展得并不完善,自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相同点。以上各种因素为那种字当句对的直译法在《圣经》翻译中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然而,在中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在古代的中国,佛经的原文是用梵文或者波斯语书写的,这些语言大多属于印欧语系,梵语或者西域语,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同佛经原文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且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因此,在翻译佛经时,要在梵语、波斯语和汉语之间用直译法机械地转换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直译法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的使用是非常有限的,无法与古代欧洲的《圣经》翻译同日而语。实际上,只要处于不同的语系,无论是汉语译为其他语言还是其他语言译为汉语,直译法的使用都会受到一定限制。

### 六、结语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还是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和意译之争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两种翻译原则交替主导翻译活动并逐渐趋于成熟直至二者最终有机融合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社会规律作用的结果。<sup>[8]</sup>中西译学理论起源于宗教翻译,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实践分别为中西译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思想,是其演进、发展的原动力。直至今日,在直译与意译这对矛盾上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直译与意译将会是一场无止境的争辩,如果把矛盾的焦点永远停留在直译意译孰是孰非的问题上那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需要的研究工作应当是通过直译和意译这些表面现象而深入探求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各国文化将趋于融合,我们期待中西翻译理论上的“同化”是不远将来的现实。

### 参考文献:

- [1]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23.
-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41.
-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4.
- [4]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5.
- [5] 刘重德. 文学翻译十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51.
- [6]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2-33.
- [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8.
- [8] 骆乐. 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 (4): 57-59.